



万世师表

——陶行知

重庆市合川区文化委员会 编
重庆市陶行知研究会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万世师表

——陶行知

重庆市合川区文化委员会 编
重庆市陶行知研究会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世师表——陶行知 / 重庆市合川区文化委员会,
重庆市陶行知研究会编. —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621-7976-4

I. ①万… II. ①重… ②重… III. ①陶行知 (1891-1946) — 教育思想 — 研究 IV. ①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0312号

万世师表——陶行知

WANSHISHIBIAO——TAOXINGZHI

重庆市合川区文化委员会
重庆市陶行知研究会 编

责任编辑: 高 勇

书籍设计:  周 娟 涂 敏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 400715

<http://www.x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学林建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64千

版 次: 2016年8月 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 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21-7976-4

定 价: 25.00 元



重庆市合川区文化委员会
重庆市陶行知研究会 编

《万世师表——陶行知》编委会

顾 问：宋乃庆 徐仲林

主 任：左学耕

成 员：刘 智 汤海涛 冉 春 吴 渊
杨大用 李小勇 王学文



前 言

这本书由重庆市合川区文化委员会和重庆市陶行知研究会联合组织人员编写而成。

在中国近代史上，陶行知先生是“一代巨人”，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是“万世师表”。陶行知先生学贯中西，勇于创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他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教育思想的精华，总结自己教育实践的经验，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生活教育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学说。他大力提倡普及教育、全民教育、创新教育、终身教育……不断探索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道路，他的教育学说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一种教育思想。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代性，突出表现在它对当前我国深化教育改革的指导意义。他的教育思想是“大众的”教育思想，其根本目的是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他的教育思想是“创新的”教育思想，旨在探索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社会实践能力；他的教育思想是“开放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学生生活相结合，还是要求手脑并用、从做中学，都是对学校教育脱离社会、书本脱离生活、劳心与劳力相对立的陈腐传统教育的一个反动。我们今天重温陶行知先生这些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教育思想，对于开展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都具有很强的启迪价值和借鉴意义。

编 者

2015年5月



MULU
目录

上 篇 陶行知生平及其教育活动

第一章 求学经历	2
第二章 传播、实验新教育	9
第三章 普及平民教育和国难教育	21
第四章 乡村教育实验	30

下 篇 陶行知与育才学校

第五章 育才学校概况	46
第六章 生活即教育	56
第七章 社会即学校	70
第八章 教学做合一	84

附 录 一	97
-------------	----

附 录 二	121
-------------	-----

附 录 三	140
-------------	-----



SHANGPIAN / 上篇

陶行知生平及其教育活动



第一章 求学经历



图 1-1

陶行知原名陶文濬，字进昌，后改名陶知行、陶行知。1892年11月11日生于安徽徽州歙县。他的父亲名叫陶长生，曾任徽州府休宁县万安镇册书（古代主管政府公文的职员），后回家经商种田，是一个乡村文化人。（图1-1 陶行知童年居住的陶家巷）

按照古代习俗，小孩到了6岁就要发蒙读书识字。陶行知6岁时因资质聪明，受到村中私塾先生赏识，免费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此后，陶行知并没有马上进学堂，而是在家中随父亲读书习字，接受传统儒学教育。8岁时，进入万安镇吴尔宽先生开设的私塾做伴读。（图1-2 陶行知童年时就读的私塾）13岁时，陶行知的父亲因为吸食鸦片，身体衰弱，家庭经济状况也因此变得窘迫，陶行知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农闲时陶行知仍然非常爱好读书，其父也尽自己所能来教育他，指导他攻读儒家经典。父亲的知识毕竟有限，很快就难以满足陶行知的求知欲。后来，在亲友的介绍下，陶行知又向当地著名的秀才和贡生求学，分别修习“四书”和“五经”。凭借父亲的言传身教和四处求学这两条途径，陶行知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传统学术基础，为自己的知识体系建构做出了最基础的铺垫。（图1-3 少年时期的陶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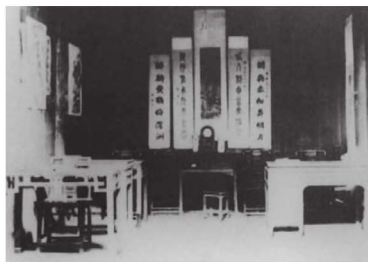


图 1-2



图 1-3

一、小学与中学

正当陶行知在传统文化教育体系中孜孜以求时，中国教育制度发生了巨变。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与科举制相伴的传统教育制度也随之解体。中国开始实行全面的教育改革，清政府和各省开始创办新式学堂，形成了一种由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在此体系中，既有政府创办的公立学校，也有教会创办的私立学校。在科举制度废除后，教会学校得到快速发展。

科举制度废除后，正值学龄阶段的陶行知再也没有必要专注于“四书”“五经”了。为了获得日后安身立命乃至建功立业的知识，必须改换门庭另辟新的求学路径。当时的歙县有一所教会学校——崇一学堂，这是一所相当于高小和初中低年级程度的学校。由于陶行知父亲是基督徒，母亲在这个学校做勤杂工，所以在1906年，陶行知得以进入该校就读。崇一学堂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在文化特质上与传统私塾学馆有所不同。学堂里既有传统的儒家经典教学，又有语文、数学、西医等新式课程，可谓新旧杂糅、中西并存。陶行知在这里学完了学堂的全部课程，其中语文、数学等学科成绩优秀。陶行知在这里所学的新知、新学，是他生平第一次接受有别于传统文化的异质文化。从陶行知的课业成绩来看，他对新学的态度是积极认可和接受的。崇一学堂时期的学习，对陶行知进行了初步的西学启蒙，为他打开了窥视外部世界的窗户，准备了一块走向外部世界的跳板。（图1-4 陶行知在崇一学堂求学时的宿舍旧貌）



图 1-4

二、金陵大学

1908年春，崇一学堂停办，陶行知提前毕业。毕业后，他很渴望到更高层次的学校学习，可是当时公立学校收费颇高，陶家经济困难，无力承担这笔开支。陶行知只好遵循教会学校的程序，在崇一学堂老师的指导下，前往杭州投考同为教会学校的广济医学堂。从后来陶行知在大学发表的文章来看，他对学医一直抱有兴趣，加之在崇一学堂学了一些医学常识，更加坚定了他

学医的理想。但理想很快被现实摧毁。由于广济医学堂存在严重的宗教歧视，陶行知此时还不是基督徒，入校注册后，发现学校在学习、生活各方面的安排上都存在歧视，三天后他就被迫退学。从此，陶行知放弃学医的志向，但他对医学的兴趣仍然不减。

此后，陶行知几经辗转，一度流落苏州数月以寻找出路，但都没有结果。在这期间，他经过观察思考，深深感觉到中国教育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新学盛行，新式学校在全国各地成为主流，要想到更高层次的学校学习，就必须学好英文。于是，他返回徽州，用一年的时间专心学习英文。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有较明确的认知，对新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并主动学习英文以掌握学习新知的工具，其知识结构、学习视野相较于私塾辍学时更为开阔。

1909年，陶行知进入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之一）预科学习，1910年9月，正式入读金陵大学本科。在四年的本科学习期间，受时局影响，陶行知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学习有所中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陶行知返回家乡徽州，担任徽州议会干事，并参加了当地的革命起义运动，半年后才返回南京复学。虽然学业有所中断，但陶行知各学科学习成绩仍然优异。由于金陵大学也是一所基督教会学校，各学科课程计划中均包含有较为系统的宗教课、宗教仪式等。于是陶行知便开始系统了解基督教教义，并在毕业前皈依基督教。

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学校盛行王阳明心学研究，陶行知受此影响，痴迷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尤其欣赏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哲学观点，遂于1911年改名为“陶知行”。20多年后，陶行知结合自己的人生实践，认为王阳明的这个哲学命题不完全正确，“知”与“行”的关系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于是他便在1934年改名为“陶行知”。但据资料显示，他在求学期间（包括在美国留学期间），学校注册的正式姓名一直是“陶文浚”。

1913年，陶行知担任金陵大学学报《金陵光》的中文版主笔（即主编）。他在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代表性文章有《一夫多妻之恶结果》《导引新生之倡议》《为考试事警告全国学子》《伪君子篇》《杀机之天然淘汰》。从文章内容可以看出，陶行知早期的学术兴趣是以教育问题和道德问题为主，并开始涉及心理问题研究。（图1-5 陶行知担任主笔的《金陵光》

中文版)

在大学期间，陶行知还锻炼出了出色的辩论才能。在1914年的文艺会第二次辩论会上，陶行知就“中国能否建立民国”，以反方雄辩取胜。同年6月，在12名毕业生中，陶行知获得第一名，并与另两名同学获准留学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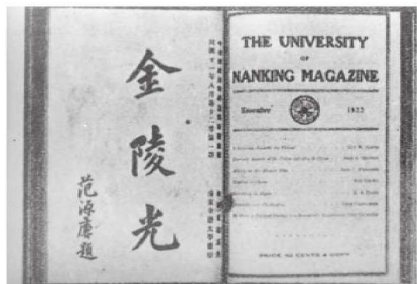


图 1-5

作为一个出身贫困的子弟，陶行知之所以有机会留学美国，这与金陵大学为美国教会系统所办有关。当时的美国教会在中国建立了众多的教会大学，其中最著名的是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这些学校基本采用美国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 and 教育方法。陶行知在金陵大学学习近五年，对美式教育感受深刻，眼界更为开阔，赴美深造的想法也日渐强烈起来。美国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也对中国学子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当时梁启超刚从欧美游学回来，发表了《新大陆游记》《欧游心影录》，阐明了欧洲的衰败和美国的新盛，震撼了当时的青年学子，对陶行知也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美国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用于支持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也为陶行知的留学提供了物质条件。

1914年8月，陶行知与清华学校毕业生陈鹤琴（后为我国著名儿童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等人一道，前往美国留学。（图1-6 金陵大学毕业时的陶行知）



图 1-6

三、留学美国

陶行知在美国留学的第一所学校是伊利诺伊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第二所学校是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14年9月，陶行知顺利入读伊利诺伊州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实为硕士），学制三年，主修课程均为政治学。按照伊利诺伊州大学学制，陶行知还可以选择副修学科。基于兴趣，陶行知选择了经济学和教育学。从后来的学科成绩看，陶行知的政治学成绩优良，但经济学与教育学成绩一般，尤其教育研究法成绩最差，没有通过考试。

这期间陶行知还担任了伊利诺伊州大学中国留美学生会中文书记，并继



图 1-7

继续关注国内时局、教育和道德问题，在母校《金陵光》上继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有《民国三年之希望》《医德》《共和精义》。（图 1-7 陶行知在伊利诺伊州大学时与同学合影 左三为陶行知，左二为孙科）



图 1-8

1915 年夏，陶行知获得伊利诺伊州大学政治学文科硕士学位。（图 1-8 陶行知在伊利诺伊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时留影）

1915 年 9 月，陶行知从伊利诺伊州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从事教育学研究，攻读博士学位。陶行知留美时，正是美国进步教育运动风行之时。所谓进步教育运动，是当时欧美教育界的一项改革运动。19 世纪后期工业时代的新

形势，对欧美国家的学校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传统的教育理论、方法和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一些新兴的教育家提出新的教育理论，主张实验新的教育形式、内容和方法，这项改革运动在欧洲被称为“新教育运动”，在美国被称为“进步教育运动”。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的重镇就是哥伦比亚大学，进步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杜威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哥伦比亚大学是一所在国际学术界和教育界享有盛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其师范学院是世界上研究教育的最高学府，荟萃了当时世界上顶级的教育学家，除杜威外，还有教育史学家孟禄、教育心理学家桑代克、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教育学家克伯屈和贝来格。这些教授均是享誉世界的教育学大师。

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行了两年系统的教育学学习。根据有关资料显示，陶行知在这两年中的修习课程有：美国公共教育管理、学校与社会、教育史、教育哲学、财政学、进步社会的教育、中学原理、国外学校体制的社会基础、教育社会学实习、教育社会学讨论等。这一系列课程的学习，使陶行知形成了良好的教育学知识结构，为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和此后的事业抉择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期间，陶行知受到老师们的格外器重与厚爱，并得到孟禄、哈罗德·罗格、唐纳德·G. 特维克斯伯里等著名教授的指

导与帮助。在名师们的熏陶下，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得到极大的发展，尤其是杜威和孟禄对陶行知影响深远。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陶行知产生了深刻影响。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社会政治层面强调用实验的方法解决西方社会问题，在教育层面主张进行“教育实验”。他把学校比喻为教育学的实验室，认为实验的目的是改良旧有教育制度，并著有影响世界的教育学著作《学校与社会》。在书中，杜威主张建立实验学校，认为学校的课程要以儿童的四种基本技能（社会、制作、探究、艺术）为基础制订，要以使儿童的本能适当表现出来为原则，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尤其注重“从做中学”。杜威认为，



图 1-9

在教育过程中，儿童始终处于中心地位，一切活动都从儿童的生活中引出，儿童的经验是课程和教材的依据。杜威门生众多，桃李满天下，陶行知、胡适均是其学生。陶行知侧重教育学，胡适侧重哲学。但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是陶行知。（图 1-9 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与同学合影 右一为陶行知，右二为胡适）

克伯屈是杜威的学生，他与杜威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他是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克伯屈继承了杜威的“从做中学”的教育思想，提出废除班级授课制度，打破学科界限，摒弃传统的教科书，让学生根据其兴趣和需要，从实际生活环境中提出学习目的，并通过实际活动去完成学习目的。陶行知与克伯屈过从甚密，受教良多，以至于陶行知回国后还请克伯屈来南京晓庄学校参观指导。

孟禄更是对陶行知热心提携扶助，其教育思想对陶行知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陶行知刚进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一度没能申请到美国返还庚子赔款的有关项目资助，全靠自己打工为生。不久，陶行知的父亲去世，此时他已经结婚，妻子在老家。他除了自己读书的费用，还需要挑起国内家庭的负担，生活非常拮据。孟禄知道情况后，积极帮助他解决困难。孟禄不仅帮陶行知联系庚子赔款项目组织，解决了他的资助问题，还向美国其他教育基金组织申请，为陶行知申请了奖学金。后来，陶行知在完成博士论文过程中遇到资料收集的问题，需要他回国进行教育调查，可回国和调查都需要昂贵的费用，陶行知承担不了这笔开销，国内也正值军阀混战，开展调查有很大的困难。



图 1-10

基于此，陶行知很难在毕业前完成论文，孟禄体谅他的困难，并从他的安全考虑，支持他直接申请毕业考试，回国后再继续完成博士论文。为此，孟禄特地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评议委员会，证明陶行知已经达到博士的学术水准，请求学校为陶行知安排特殊的考试，以认定其毕业资质。学位评议委员会采纳了孟禄的建议。陶行知回国后，继续坚持撰写博士论文，可惜由于宿舍楼失火，陶行知的论文稿子被烧毁，最终未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这是陶行知的一桩憾事。后来人们也叫他陶行知博士，并非因为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而是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授予他理科荣誉博士。（图 1-10 圣



图 1-11

约翰大学授予陶行知荣誉博士学位时所穿过的博士服)

孟禄也是一位基督教徒，他强调要为推动教育发展而牺牲奉献。这种精神深深感染了同为基督徒的陶行知，成为陶行知一生从事社会改造的精神动力。

（图 1—11 陶行知回国前与同学临别留影）

不仅哥伦比亚大学系统的教育和名师的悉心指导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当时美国盛行的进步教育实验也给了陶行知深刻的影响。据陶行知后来回忆，当时的美国从事教育实验的机构和个人几乎无处不在，陶行知在这里读书期间参观了很多实验学校，对新教育有切身的感受，并深感美国乡村教育的普及和交通的发达。这些为日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 传播、实验新教育

1917年秋，陶行知毕业回国，应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先后改名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以下简称为南京高师）专任教员，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学等六门课程，并介绍遗传学，全面引进新教育，主持和参与新教育学术活动。不久，陶行知又担任了南京高师教务主任，试行新教育改革，从此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教育生涯。陶行知在回国后的最初五年里，将主要精力投入宣传新教育思想和试（实）验新教育改革中。

一、传播新教育

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教育革新运动受到双重阻碍：一方面是北洋政府1915年颁布的以“法孔孟”为核心、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是德国、日本教育模式的束缚。清朝末年，中国学生主要留学日本，日本的教育体系受德国的深刻影响。日、德教育体系又以欧洲传统教育思想为主导，主张严格的分级、分班、分科教学，强调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学习。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在中国教育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国教育制度、政策、法规的制定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教育在这双重压力下，难以前进。当时中国教育界的先进人物如蔡元培、黄炎培等人士深感中国教育体系的落后、僵化，提出积极借鉴各国教育界的改革经验，以改革中国教育。陶行知回国不久，就发表了他留学归国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系统介绍了试验主义的历史功绩，并批评中国传统教育思想。1920年，陶行知又在《新教育》月刊创刊号上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系统介绍了以试验主义教育为代表的美国教育改革运动，并将之运用于中国。此后又宣传民主教育和女子教育，将世界教育革新运动的新风引入中国。

第一，批判中国传统教育。

陶行知回国后，反思中国传统教育，他认为：吾国办学十余年，形式上

虽不无可观，而教育进化之根本办法，则无人过问。故拘于古法，而徒仍旧贯者有之；慕于新奇，而专事仪型者有之。“沿袭古法”体现在做事、写文章处处讲求援引前人典故先例。只要有先例，就算是错的，也认为是对的；没有先例，就算是对的，也得不到认可。“专事仪型”则体现在不理解国外教育的思想内涵，盲目学习国外的教育制度，追求形式上相似；学习外国也没有固定的目标导向和对象，时而学德国，时而学日本，时而学法国、美国。要改变这种现象，必须用科学的、试验的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来建立中国的教育制度，形成符合中国社会和个人需要的教育方法。至于外国和中国古代的经验，有用则用之，无用则坚决摒弃之。

陶行知还用从杜威处学来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针砭中国的旧教育，提出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改造旧教育。旧教育在教育制度、教育管理、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上“沿袭陈法”，食古不化，拒接新知，故应该以实验精神养成其自得（自学）的能力。能自得，就能发明，能发明，教育则自然能够更新。旧教育“仪型他国”，不管他国情况是否与中国相似，盲目学习，故要用实验主义的方法，仔细辨别，审慎取舍。总之，他认为实验主义是中国教育破旧立新的最佳工具，“既能塞陈旧之源，复能开常新之道，实验之用，岂不大哉！推类至尽，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皆实验之责任也”。同时他还认为，近代以来科学发展、教育进步都是受实验主义的积极影响所致。

陶行知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教育改革的最根本点在于共和民主教育的日益壮大，并取代以军国民教育和阶级教育制度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其中，德国的教育改革最有说服力。德国曾盛行传统教育，但自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传播以来，德国的教育宗旨、教育行政、学校组织、教员、课程以及社会教育诸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把军国民教育和阶级教育制度的旧传统涤荡无余。因此，陶行知也希望这股教育改革的“狂风”能吹到中国，将照搬德国、日本模式的中国教育制度也“拔得干干净净”，继而在中国建立起平民主义教育制度。

第二，宣传实验主义教育。

陶行知认为，科学的实验方法应该是：设统系，立方法，举凡欲格之物，尽纳之于规范之中。远者近之，微者大之，繁者简之，杂者纯之，合者析之，分者通之，多方以试之，屡试以验之。更较其异同，审其消长，观其动静，察其变化，然后因果可明而理可穷也。所以，“试验虽不必皆有发明，然发明必

资乎试验”。举凡学术的进步、知识的更新、理论的发衍，无不贯彻试验精神，采用试验方法。依据进化论，教育也当是处于不断进化中，若求其进步，亦无不从“试验”二字得来。因为“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有发明之力者虽旧必新，无发明之力者虽新必旧”。

陶行知还对怎么建设“试验的教育”提出四种办法。

首先，要注意发展实验心理学。他认为心理学是一切教育的根据。教育要发展，必须在心理学上注重实验。当时中国各级师范学校所教的心理学或偏重于书本知识，或偏重于主观经验，缺乏必要的科学实验的仪器设备。因此，要建立实验心理学体系，运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验，建立可信的心理学。如此，基于心理学的教育学就不会是空中楼阁。

其次，要设立实验的学校。陶行知认为，中国当时的学校办学方式僵化，缺乏变通，更缺乏创新。即便是师范学校的附属学校，也仅是为师范学校学生提供了一个实习场地，没有发挥实验教育原理和实行课程、管理、教学、设备等改革的作用。因此，今后师范学校及教育研究机关都应该注重设立实验学校，重视教育实验。

再次，要注重应用统计法。陶行知认为，实验教育强调教育理论的形成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能单凭思辨就可获得，要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获得，也就是要将无数的教育实验的事实征集起来，分门别类，然后才能从中发现真相，做出相应的判断。这件事情做起来很烦琐，只有掌握了统计方法，才能化繁为简。因此，统计法是辅助实验的一项利器，也是建设新教育的利器，研究教育的个人和机关，都应该注重应用这种方法。

最后，要注重实验的教学法。陶行知认为，实验教育的教学法要点在于养成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五段教学法”，即预备、提示、联想、总括、应用，这种方法过于偏重形式。只有按照杜威的“实验—探索”方法，才利于养成学生试验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陶行知认为，前三种方法是针对教育改革者和研究者而言的，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一种精神方法，便于创新教育理论。而最后一种方法是针对一般国民，尤其是一般学生而言的，可使一般国民和学生能够随时随地随事去发现和创新。总之，会试验的教育家和会试验的国民都是试验教育所要养成的。

第三，宣传民主教育。

陶行知认为，共和民主精神和谋求共同幸福是新教育的根本目的，共和